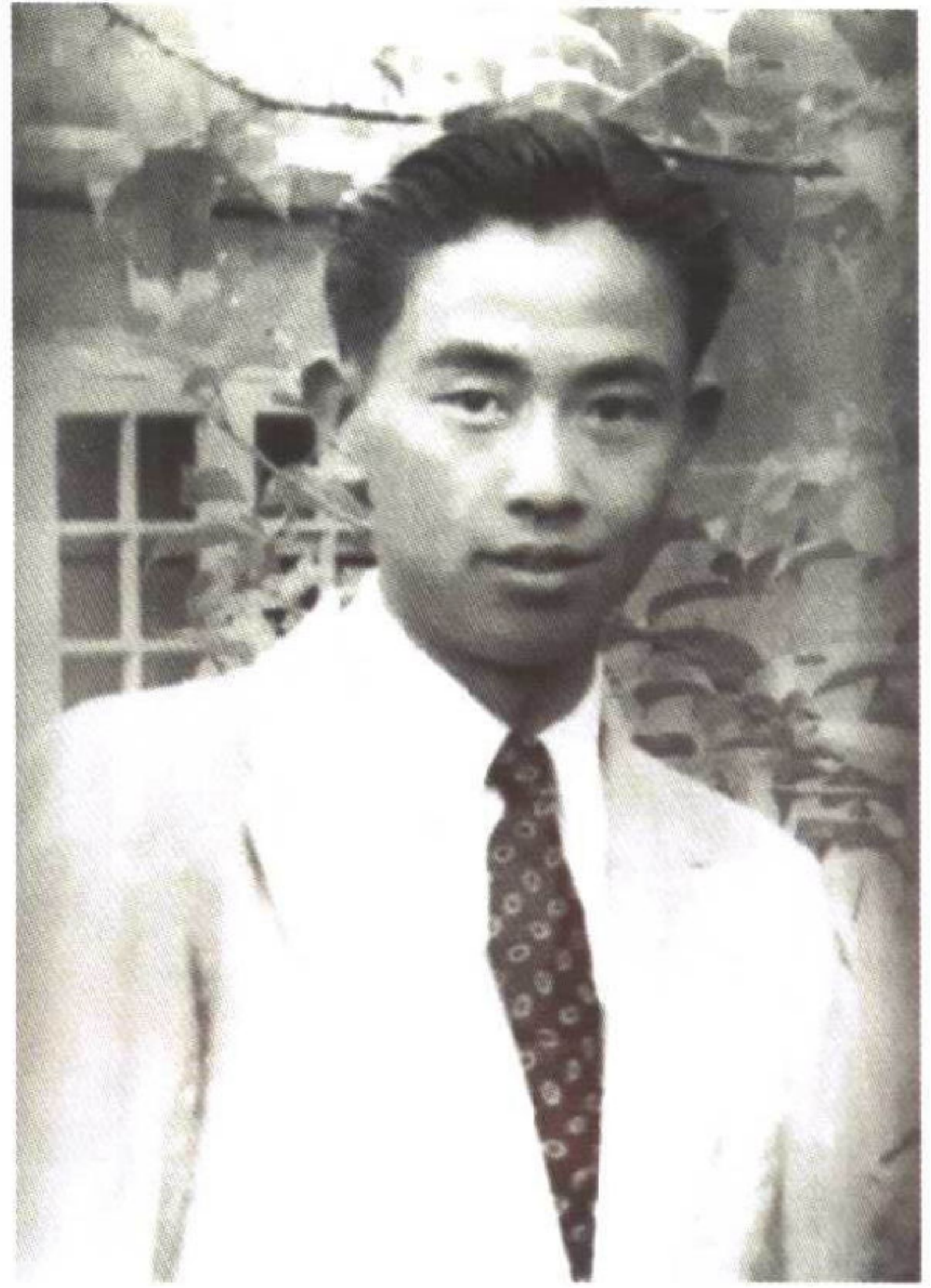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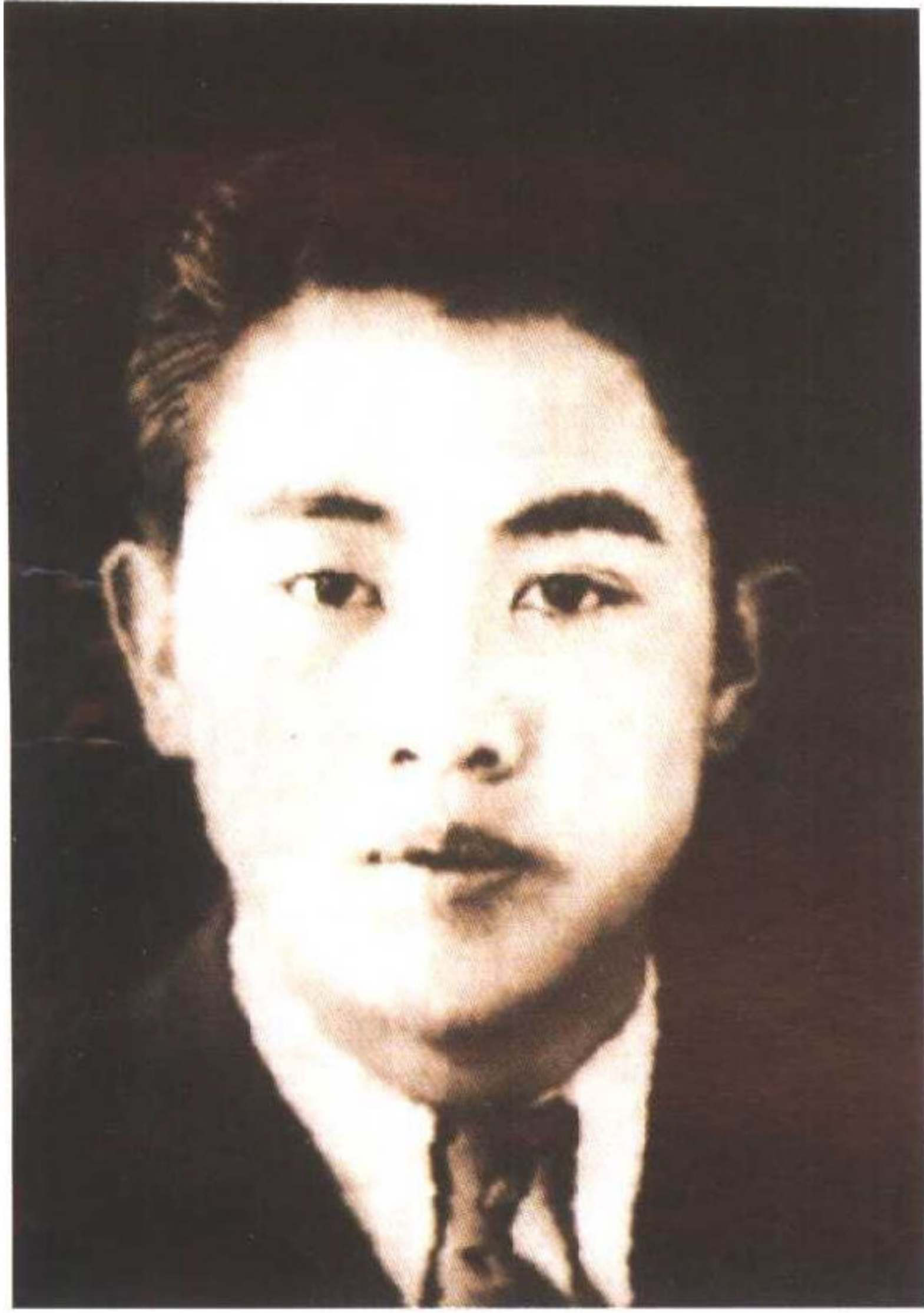


雨丝风片录

谷斯范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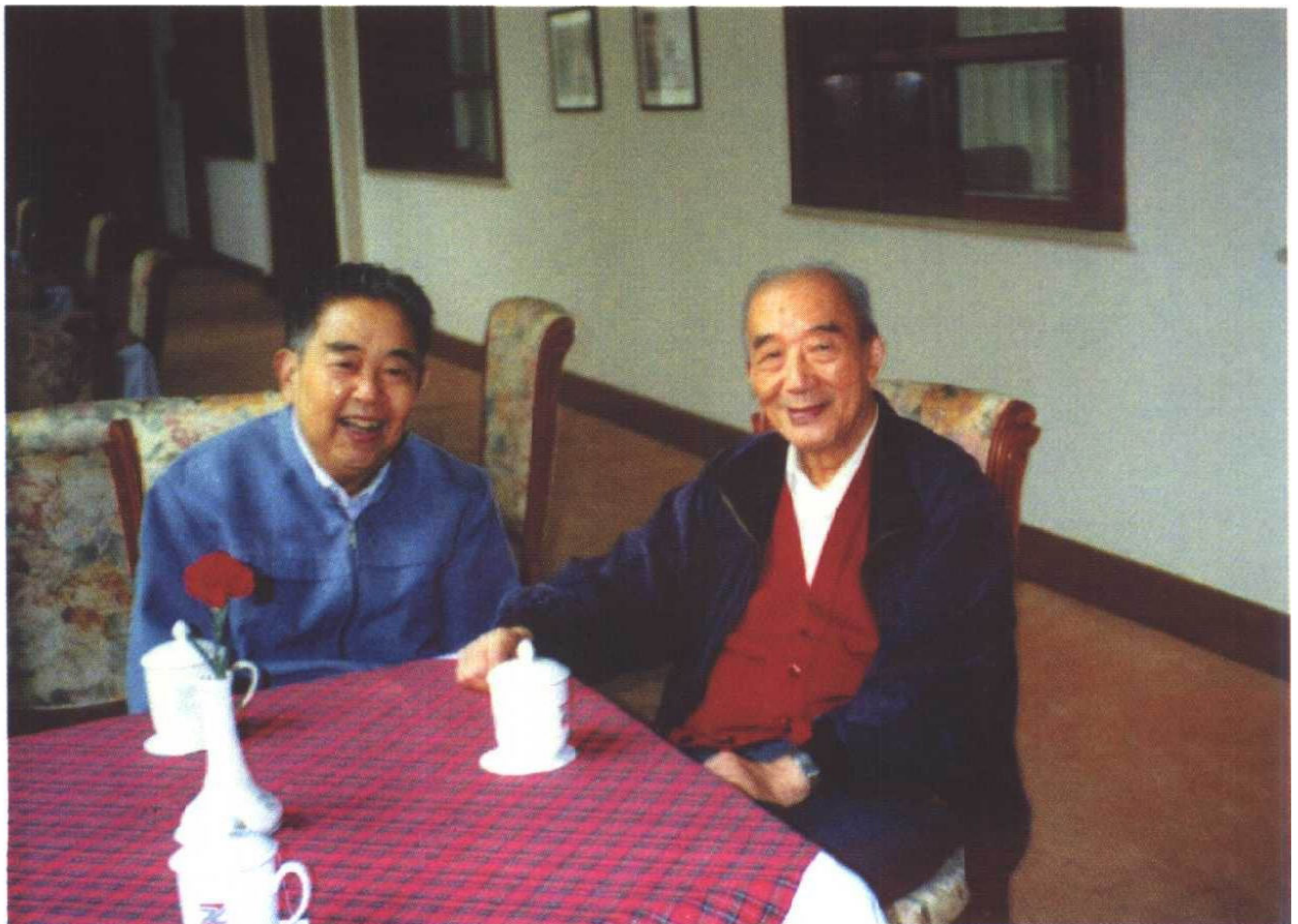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初期的留影。



作者与爱妻张迪慈 1956 年于上海。



作者在书房笔耕不辍。



1998年10月，作者与著名诗人光未然（右）合影于杭州（此为作者生前最后的留影）。

序

梅 益

在谷斯范同志逝世一周年前夕，他的老伴张迪慈同志给我一封信。她说：“梅益：您好。唐康大姐（她是林淡秋同志的老伴）转告了您的问候和安慰，真令我十分感动，谢谢您对斯范的怀念和对我的关心。斯范自去年4月上旬不幸逝世，至今已一周年了。一年来，各地老友先后来信、来电，悼念之余，都问及斯范遗作的整理与出版事宜。今经浙江省作协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商定，由该社出版斯范的回忆录《雨丝风片录》（曾于1991—1994年在《新文学史料》连载）。此书全文约26万字，记述了斯范33岁之前（即1948年之前）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与早期文学创作生涯。书中涉及不少那个时代的人和事，这些人和事今天恐怕只有您是熟悉和了解的了，因此，我恳请您为《雨丝风片录》题序。这是斯范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遗作，若有可能，敬请允诺题序，谢谢。斯范一向敬重您，想这也一定是他所希望的。”

谷斯范同志在《每日译报忆旧》，即《雨丝风片录》（四）中，又提到要我写序，他说：“当年《译报》同仁，最了解情况的只有你了。《译报》在抗日战争初期的‘孤岛’是起了不小作用的，胡仲持等先后去世的同志，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希望你在给这个长篇写序的时候，多谈《译报》，多谈当时的老战友。”我在序里说：谷斯范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是理解的。当我读着《新水浒》的时候，我就不禁想起了当年“孤岛”的情况，为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后来

的种种不幸遭遇而唏嘘不已，我们再提这些，决不是要感慨一番，而是互相勉励，决不要让往事重演。

《译报》的创办是很简易的。当时，上海文委商定要利用英、美、法和日本在租界的矛盾，用外国报刊发表的有利于我抗战宣传报道的新闻评论来出报，以打破敌伪的新闻封锁。我根据孙冶方同志的通知，和夏衍同志一起到华龙餐厅找《大公报》的钱君匋先生。我们三个人讲定到爱多亚路大公报社碰头，约定《译报》这四开一张小报利用大公报社的设备和办公室，每天晚上10点左右从编译、定稿、校对到划拼大样，都要完成。《译报》出刊后不到十天就被禁止。接着出版的《每日译报》就不在那里办公排印，此后夏衍同志南下广州，我一个人搬到朱葆三路新办公室去发稿。行政工作都由赵邦荣同志操办。我和谷斯范同志就在那里办公，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，都是共产党员。大概晚上7点多各人吃过晚饭就到报社来，晚上11时，十多个人不约而同到爱多亚路路边的饭摊吃一碗盖交饭（一大碗米饭上面加一块排骨），然后拐到朱葆三路口等末一班电车回家。报馆门口没有招牌，没有警卫，每月逢五给几块补助费，没有工资，更没有津贴奖金，连电车的票都要自己掏钱买，逢五发不出钱是常事。在办公室的角落里，堆着几个铺盖卷，晚上人散后，有几个人在办公桌上铺开铺盖卷睡到天明。报馆朝马路一方的窗总是开着的，有时汉奸就朝窗口扔进手榴弹。每天从凌晨到坐末班电车回家，随时可能被汉奸收买的暴徒戳上几刀。因此每天回家时分，家人时常站在阳台上提心吊胆张望。报纸出版后很受市民欢迎，当我们没钱办不下去的时候，报社号召读者支持我们，报馆门口时常排起长蛇阵，小贩、报童、黄包车夫、一般市民都掏出钱来放进收捐款的木箱里。胡愈之同志有一次托一位姓梁的教授从香港给我们带来一大包钞票，这是香港市民捐给《每日译报》的。

报社同仁中同谷斯范同志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王任叔同志了。大约70年前，也就是1928年，王任叔是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

的国文老师，谷是初中生。1938年2月谷经胡仲持介绍到《每日译报》当校对，王任叔编副刊《大家谈》。刚开办时他要谷斯范写章回小说《太湖游击队》，王经常帮助谷。王在当时是有名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，他在20年代就参加共产党。抗战初期，党领导决定这位后来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者去做黄包车夫的工作，王任叔很快就到车行租了一辆车到黄包车夫扎堆的地方去工作。他本来有肺病，跑了几天跑不动了。后来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了，他开始参加协会，后经胡愈之、钱俊瑞介绍，在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。1940年他给我一个电话，说他可能南行，可能去新加坡同胡愈之见面，还说要我关心他创办的两个培训青年的学校。一个是“文学讲习班”，有三百多青年学生，还有一个是职业女中，这两个单位都培养了几百位青年干部，后来大都到陕北和新四军深造和工作。解放后，中央派他到印度尼西亚当大使。他从印尼回到北京，我和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见了面，他说，他正在写一部印度尼西亚历史。1957年他因同情苏联肖洛霍夫的遭遇，写了一篇叫《论人情》的文章，受到一些“左”，倾文化人的批判，说他在放毒，是修正主义分子，成了当时文化界一个靶子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他被革了职，当了牛鬼蛇神，被批斗，见他的人说当时他胡子有二三寸长。后来他被押回浙江老家，究竟是怎样死的，不清楚，反正家破人亡了。

《每日译报》第二次被禁止出版发行是1938年2月18日，租界工部局说因没有办妥出版手续，禁止出版，同时被禁止的还有《导报》、《大英晚报》、《华美日报》、《华美晚报》。没有办好手续，这完全是胡说，禁止《每日译报》出版的不是租界的工部局，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与汪伪政权，他们早就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迫使这些报纸的外国发行人退出，这方面英国大使馆是花了大力气的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斗争，外国发行人不是因为我们给的钱少，而是怕死，惟日本帝国主义是从。

《每日译报》等停刊不至于使上海舆论界出现一片空白。我们

事先已经作了布置，当时在上海出版的《上海周报》仍在继续发行，每月可销三四万份，此外还有《求知文丛》、《学习》等等。

《每日译报》成败的经验很值得总结，但我们没有写出来。当年我们的工作有不少缺点，复刊后的《每日译报》也做了不少工作，取得一定成绩，党中央曾对它作了评价。1950年出版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《中国共产党上海史》，对《译报》和《每日译报》有过评论，它说：“由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新闻文化工作者，以其出色的成绩为上海的抗日宣传工作写下了辉煌的一页，由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新闻宣传阵地，对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发挥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，它增强了孤岛初期上海人民的抗战信心，为上海人民指明了一条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，使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、全民抗战的思想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的辉煌战绩，深深扎根在上海人民的心中，为稳定孤岛初期上海民心起了重要作用。同时党领导的和受党影响的新闻宣传阵地，在坚持团结、反对分裂，坚持进步、反对倒退，坚持抗日、反对投降方面，也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，有效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，有力地打击了投降势力，并使日伪投降论无用武之地。”负责领导上海工作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，对这一时期上海新闻出版工作曾予以充分肯定，认为“上海的新闻出版工作搞得活跃，对香港、内地都有影响，应当加以表扬”。（见《中国共产党上海史》第1097—1098页。）

2000年5月于北京

目 录

序	梅 益
雨丝风片录〔一〕	(1)
雨丝风片录〔二〕	(14)
雨丝风片录〔三〕	(30)
雨丝风片录〔四〕	(54)
雨丝风片录〔五〕	(83)
雨丝风片录〔六〕	(107)
雨丝风片录〔七〕	(135)
雨丝风片录〔八〕	(157)
雨丝风片录〔九〕	(185)
雨丝风片录〔十〕	(207)
雨丝风片录〔十一〕	(238)
雨丝风片录〔十二〕	(259)
雨丝风片录〔十三〕	(286)
巨籁达路174号	(322)
后记	(337)

雨丝风片录〔一〕

我爱我的母校。浙江省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，20年代曾蜚声全国。它不仅有山水如画、风物宜人的环境，还有第一流的校舍，第一流的师资，第一流的图书仪器设备。校长经亨颐，这位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，杰出的现代教育家，也是精通篆刻书画的艺术家，亲自参加校舍建筑的设计，教学大楼“仰山楼”，作师生宿舍用的“曲院”、“西雨楼”、“一字楼”，图书馆、科学馆、食堂、劳作课工场等，建筑式样各异，有的庄严、朴实，有的精巧、幽雅，且全部有回廊相通，雨雪天来往不用带雨具。经先生有个主张，办好学校教育，一靠师资，二靠设备。他所聘教师如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杨贤江、朱光潜、匡互生、丰子恺、刘薰宇、刘叔琴、赵廷为、王任叔、毛路真、张孟闻等，都是响当当、掷地有声的人选。教务主任杨贤江是经先生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的学生，早期中共党员，与恽代英同是党内最早的青年运动领导者，多年担任商务印书馆《学生杂志》的副主编，著有《新教育大纲》、《教育史ABC》。训育主任匡互生是学生运动的老将，在湖南读中学时，写文章反对督军汤芑铭，几遭毒手。逃往北京，进北京高等师范读书。五四运动爆发，学生们围攻卖国贼曹汝霖住宅，头一个冲进去的就是他。说到设备，钢琴数量之多、试验仪器的完备、图书馆藏书的丰富，也是当时全国中等学校所少见。有个传说，1922年3月，新校舍落成，捐资兴学的创办人陈春澜，打算为经先生在白马湖畔修筑一座精致住宅。经先生说：“你老有此好意，不如省了修筑住宅的钱，给我一万银元，我正缺钱用。”他得到这笔钱，全部给学校添购图书。所以图书馆不仅有一般中等学校所缺乏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大批古籍藏书，还有日、德、英、法四种外文

书籍。

我是1931年夏天初中毕业离开母校的，算来已整整60年。这60年是个伟大的时代，我们祖国起了有史以来空前的巨大变化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一跃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。就我个人来说，风云变幻的60年，成就虽小，总算没有误入歧途，这要感谢我们母校。在白马湖的三年，对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：一是白马湖有浓郁的文学空气，经先生高瞻远瞩，请来了一些名作家当教师，如夏丏尊、朱自清、丰子恺、王任叔等，使我接近了文学，爱好文艺。其二，春晖中学在政治上接受了“五四”的传统，反对封建专制，向往民主与自由。“四·一二”事变后，师生们对国民党的屠杀进步青年，专制独裁，政治腐败，抱强烈不满。这跟经先生的政治态度分不开。他早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书时，就跟孙中山、廖仲恺相接交，倾向革命。1924年1月，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改组国民党，制订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。经先生热烈拥护，以后就与廖仲恺、陈树人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中坚。蒋介石叛变革命，经先生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的得意学生，早期中共党员宣中华、汪寿华、叶天底被杀害，他非常气愤。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，绝不同流合污，与何香凝、陈树人、柳亚子等组成“寒之友社”，诗画言志，坚守革命节操。经先生把白马湖象山脚下的私宅题名为“长松山房”，有诗说：“为木当作松，松寒不改容。我爱太白句，居亦曰长松。”他们经常在此聚会，松荫月下，吟诗作画。经先生与陈树人合作一幅《竹菊图》，他题诗：“西风飒飒竹生寒，衰草萋萋菊又残。莫道秋光无艳色，虚心傲骨耐人看。”又题何香凝所画《松梅图》：“万古长松不改容，空山随处白云封。天心仍向寒枝现，冷落春光淡复浓。”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乐观精神，充分流露于字里行间。

1987年6月20日，经亨颐先生诞辰110周年，我去上虞县家

乡参加纪念会，作了《经亨颐与蔡元培》的书面发言。我觉得两人有可惊的相似之处。他们是同时代人，蔡元培比经亨颐年长9岁，两人都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。我进春晖读初中的时候，经先生已不过问校务，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的范寿康继任校长，他自己在“长松山房”绘画作诗，或长期外出，只在山麓的行人道上见过他几次。但印象太深刻了！颀长的身材，穿一件灰色长袍，长颈方额，戴一副墨边眼镜，腰背挺直，气宇轩昂。我跟蔡先生只见过一面，30年代初，随伯父到上海愚园路他的私宅访谒。中矮身材，外貌谦和厚道，说话慢吞慢吞，眼镜片后，双目炯炯有神。他一生清廉正直，世有公评。经亨颐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决拥护者，态度鲜明的国民党左派。1935年，他同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柳亚子、陈树人等，响应中共“八一宣言”，呼吁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，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。蔡元培出身科举，是翰林学士，却成了反清革命党人，任光复会会长。参加国民党后，由于跟吴稚晖、李石曾接近，有过失误，但他对蒋介石的独裁很有反感，特别对“四大家族”的腐败、贪污深恶痛绝，于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成为国民党左派。1932年12月，与宋庆龄、鲁迅、杨杏佛等发起组织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，营救了很多人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。

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，他下令大学取消经科，小学废止读经，打破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。提出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重，学校里设音乐、美术、劳作、体育等课。当时经亨颐是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，浙江教育会会长，曾多次进京，参加教育制度改革的商讨。两人在教育和学术思想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，举显而易见的几点来说：第一，1917年蔡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，一反过去校中存在的官僚习气，发扬民主风格，实行民主办校和教授治校，大大发挥了教授们的积极性。又提出“兼容并包”、“思想自由”的办学方针，聘请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钱玄同等新派教授，也聘请辜鸿铭、刘师培等思想顽固、却学有专长的教授。经先

生任校长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和后来的浙江第一师范，也实行民主办校，学术空气浓厚。他聘请的语文教师夏丏尊、陈望道、刘大白、李次九，被称为“四大金刚”，积极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；北洋军阀余孽和遗老们恨之入骨，借学生所办刊物《浙江新潮》发表了施存统的《非孝》，掀起“驱经”风潮。所加罪名是“提倡过激主义、非孝、废孔、公妻、共产种种邪说”。说“该校校长盘踞造就师资之师范学校，倡最荒谬、最狂妄之学说，贻害青年，莫此为甚。应立予撤查，依法处置”。经先生被迫出走，返回上虞家乡，说服富商陈春澜捐献银元20万元，创办私立春晖中学，以10万元建造校舍，置办设备，10万元购买股票作为基金。选定白马湖为校址，1920年破土，经两年多竣工，1922年秋季开学。春晖中学远离闹市，受到的干预较少，夏丏尊、朱自清等教师把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、《语丝》等进步刊物的文章，无所顾忌地选为课文。

其次，五四时期提出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口号，认为我国民主思想的基础薄弱，是一根本性的大患，科学技术落后，妨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要救中国必须请来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。经先生对此体会颇深，当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，读的是数学和物理科。主持浙江两级师范时，优级班选科定为史地、数学、理化、博物四科。对科技科目的重视于此可见。蔡先生于1928年辞去一切职务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直到1940年逝世，一心一意为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况出力。研究院中不少科学家如李四光、竺可桢、翁文灏、陶孟和、赵元任等，都在蔡先生的帮助下发挥所长，有了出色的成就。

第三，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重。对美育的重视，这是两人都具有的真知灼见。经先生任第一师范校长时，聘请了李叔同那样杰出的音乐美术教师，与原两级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姜丹书一起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美术人才，有的成了全国名家，如潘天寿、丰子恺。1923年5月31日，蔡元培先生来春晖中学演讲，有一段话很能说

明他为什么那样重视美育。他说：“美的东西，虽然饥不可以为食，寒不可以为衣，可是却省不来。人若终日在计较打算之中，那便无味。求美和求知识一样，同是要事。人如果只为生存，只计较打算利益，其实世间没有不可做的事。可是有一种人，自己所不愿做的无利于公的事，无论怎样有利于己，总不肯做。自己愿做的于公有益的事，无论怎样对己无益还是要做，甚至于牺牲生命，也在所不惜，这就是所谓高尚。高尚也是一种美，我们人类不愿做丑事愿做美事，就是天性爱美的缘故。”建国后我们曾走过一段弯路，不重视美育，其实，正如蔡先生所说，“美的东西，虽然饥不可以为食，寒不可以为衣，可是却省不来”。如今已有所改变，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重，这无疑将提高民族素质，对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起重要作用。

经先生和蔡先生都已不在人世了，他们对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。他们的为人，一个刚正不阿，一个清廉正直，足为一代师表。两位先生的精神不泯！

人到老年，记忆力衰退得快，很多事转瞬即忘。白马湖的三年忘得了吗？不！多少事历历在目，怎么也忘不了！母校的湖光山色，常不知不觉会闯入梦境。我12岁那年夏季考取了春晖中学初一，上学校第一次见到白马湖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我老家在曹娥江边的百官镇，到白马湖去有火车可通。百官镇是终点站，上火车东行，仅15里路就到一小站驿亭。出了站，水雾茫茫的白马湖出现在铁路线南首。靠右手有一条铺煤屑的长堤，穿湖而过，直达远处象山脚下。沿堤植着碧绿的垂柳，模样儿有点像西湖的白堤。从学校出来，如果不搭船，这是惟一的通道。我回家过星期天，一趟来回两次从这儿过，所以对它太熟悉了。从象山脚下转弯，煤屑路蜿蜒西去，一直通到校门口。沿路有一条从湖滨过来的汉港，穿过校门口的石桥，连接仰山楼前的游泳池。煤屑路两边，遍植柳树、杨树和梧桐树，树荫下的人行道，像是碧绿的深巷，充满诗情画意。我们常

在饭后课余，三三两两的来这儿散步。从山脚下转弯后，走不多远，看到路边有一座粉白围墙、黑漆大门的小院，那是夏丏尊先生的私宅“平屋”。1921年，应经校长的聘请，他来春晖中学执教，看中白马湖山明水秀，有长期定居的意思，便盖了几间平屋，院子里种了橘树和几丛天竺。他在《白马湖之冬》里说：“风刮得厉害的时候，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，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，静听寒风的怒号，湖水的澎湃。靠山的小后轩，算是我的书斋，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，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，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。松涛如吼，霜月当窗，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。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，常独自拨划着炉灰，不肯就睡……”就在这间靠山的书斋，他写下了不少作品，后来编入《平屋杂文》集子里。又翻译了意大利19世纪著名作家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，在商务印书馆的《东方杂志》连载，192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，再版三十多次，在全国影响甚广。夏先生在此书初版《序言》里说：

这书给我以卢梭《爱弥尔》、裴斯泰洛齐《醉人之妻》以上的感动。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，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，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翻阅时，还深深地感到刺激，不觉眼睛润湿。这不是悲哀的眼泪，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。除了人的资格之外，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，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。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，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，自己难堪起来，不觉惭愧了流泪。书中叙述亲子之爱，师生之爱，朋友之谊，乡国之感，社会之同情，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，虽是幻影，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，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。于是不觉就感动得流泪。……

《东方杂志》记者胡愈之君，关于本书的出版，曾给与不少的助力。邻人刘薰宇君，朱佩弦君，是本书最初的爱读者，每期稿成即来阅读，为尽校正之劳；封面及插画，是邻人丰子恺君

的手笔。都足使我不忘。

丰子恺是春晖中学的音乐美术教师，住在夏先生贴邻的小院，门前密植杨树和柳树，为此取名“小杨柳屋”。他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，李叔同的得意弟子。他的漫画别具风格，或取材古代诗词名句，或取材日常生活，不仅国内，在日本和东南亚也有很高的名声。他画漫画开始于在白马湖教书的时候。夏丏尊是他尊敬的老师，此公“慧眼识英雄”，对这些漫画习作高度赞赏，在他的怂恿下，丰子恺乐此不倦，越画越多，越画越精，终于自成一家。1925年，《子恺漫画集》出版时，所收仅他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。刘薰宇是数学教师，很有文学修养，用活泼有趣的文笔来谈数学问题，他经常在夏丏尊主编的《中学生》杂志发表这类文章。朱自清字佩弦，那时刚30出头，夏先生比他年长7岁，所以平日直呼其名，亲切地叫他“佩弦”。他们都爱好喝酒，四人常在“平屋”相聚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天南地北的聊天。刘薰宇和丰子恺是夏先生的贴邻，来去方便；朱自清住在学生宿舍曲院，听说有酒喝，会急急赶来。有时，夏先生从崧厦老家弄到贮藏多年的“花雕”或“状元红”，就兴致十足地对丰子恺说：“快把佩弦叫来！快把佩弦叫来！”夏丏尊和朱自清私交极笃，他们都是在1925年夏天辞去春晖教职的，朱先生去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，夏先生去上海与匡互生、刘薰宇创办立达学院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朱先生避难南下，准备转道去昆明西南联大执教。这时上海已沦陷，夏先生一家在白马湖暂住，朱先生思念老友，重临阔别十多年的旧地，与夏先生相见。临别，朱先生心情沉重，写了首旧体诗《白马湖》：

眼底好湖山，恍如逢故友。
丐翁诚可人，挟我共趋走。
昔者为比邻，共惊别离久。

他年一陋室，贫贱曾相守。
旦日入山村，历历鸡与狗。
暂聚还别离，依依恋陇亩。
夜起戴月行，湖光尚昏黝。
丐翁约见期，黯然望垂柳。

我进春晖中学读书的第一学期，1928年秋天，就见到了夏丏尊先生。同学们经过“平屋”，有时大门半开着，忍不住往里张望，或者门口等待，希望能见到先生一面。他是我们所敬仰的作家，很多人读过他翻译的《爱的教育》。夏先生为营救浙江第一师范学生、1923年入党的早期中共党员叶天底，多方奔走无效。听到叶天底在杭州陆军监狱英勇就义的消息，夏先生忿然辞去上海暨南大学教职，回白马湖私宅闭门写作。叶天底也是李叔同的得意弟子，丰子恺的同班同学，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未毕业离校。1920年夏天，在上海与同学俞秀松等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发起人。同时进外国语学社攻读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。第二年5月，大部分团员去苏联学习，叶天底患伤寒病未能成行。1922年应聘进春晖中学教务处，日常工作是刻蜡纸、印讲义，有时替代丰子恺上图画课。他跟同学们关系密切，又在附近的西徐岙办农民夜校。1926年7月，成立中共上虞县独立支部，他是支部书记。遇难时年仅27岁。

夏先生那时四十多岁，身子有点发胖，脸儿也是胖胖的，戴眼镜，留短胡，待人和气，说话幽默。听说屋里挂过他亲笔写的对联：“天高皇帝远，人少畜生多。”也有人说，对联是：“青山绕户，白眼看人。”从对联的语气，可以想象他对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政局，怀着满肚子悲忿。大约到冬天，听说回上海去了。以后见到夏先生次数最多，是在第二年秋天。那时丰子恺、刘质平等集资为弘一法师修筑的僧舍“晚晴山房”，已在离“小杨柳屋”不远的山坡上落成。大约

是9月份吧，那位苦修的高僧来到白马湖，夏先生为此从上海赶来，回家乡小住。他几乎每天要去“晚晴山房”跟法师晤谈，我们在路上见到他的次数就多了。

弘一法师即是浙江第一师范的音乐美术教师李叔同，他填词谱曲的歌词成了全国流行的音乐教材，特别是那首《送别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中小學生谁都能哼几句。祖籍是浙江平湖，1880年出生于天津屈指可数的富商家庭。26岁到日本留学，进上野美术专科学校。在日本创办“春柳社”话剧团，演出法国小仲马的名著《茶花女》，他饰女主角茶花女，演出《黑奴吁天录》饰女主角爱美柳夫人，名声震动东京戏剧界。“春柳社”在欧阳予倩等参加后，回国公演，成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。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和浙江第一师范任教，由风流洒脱的艺术家一变为严肃、沉默、工作认真的名教师，穿着朴素，灰布长衫，黑布短褂，平底鞋，教书7年，从来不请假。1918年暑假，那年39岁，突然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削发，以后成为佛教律宗的一代高僧。律宗戒律最严，他穿破衲，周游四方，过苦行僧生活。并潜心研究律宗，修订律宗经典，著有《南山律在家便览》。弘一法师来到白马湖，在学校中引起轰动，同学们谁都想见一见这位传奇性人物。“晚晴山房”就在路边山坡上，三间平屋，两间前面有走廊，下山来要走几十级石阶。学校作出规定，谁也不许上去，干扰法师静修要受严厉处分。弘一法师难得下山来，饭菜是夏家送去的，每顿一菜一饭，吃些清汤寡油的青菜、萝卜、豆角之类。我在路上见过他两三次，脸容清瘦苍白，一领破旧青色僧衣，脚上穿旧布条编的僧鞋。他为什么要出家？同学们纷纷议论这个“谜”。他年轻时崇拜康、梁，热心变法，戊戌政变失败，才移家上海避祸。出国留学时写过慷慨激昂的《金缕曲》：“披发佯狂走。莽中原，暮鸦啼彻，几株衰柳。破碎河山谁收拾？零落西风依旧，便惹得离人消瘦。……二十文章惊海内，毕竟空谈何有？听匣